



顾问◎黄树民 金力 徐杰舜

人类学与乡村振兴

RENLEIXUEYUXIANGCUNZHENXING

杜发春 韦小鹏◎主编

【人类学高级论坛2019卷】

ADVANCED FORUM OF ANTHROPOLOGY

江西人民出版社

人类学与乡村振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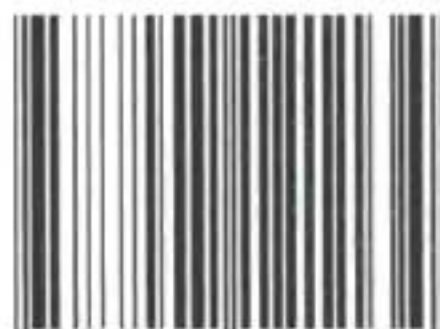
RENLEIXUEYUXIANGCUNZHENXING



人类学高级论坛

ADVANCED FORUM OF ANTHROPOLOGY

ISBN 978-7-207-12113-4



9 787207 121134 >

定价：65.00元



顾问◎黄树民 金力 徐杰舜

人类学与乡村振兴

RENLEIXUEYUXIANGCUNZHENXING

杜发春 韦小鹏◎主编

【人类学高级论坛(2019卷)】

ADVANCED FORUM OF ANTHROPOLOGY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学与乡村振兴：人类学高级论坛2019卷 / 杜发春，韦小鹏主编. —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20.7

ISBN 978 - 7 - 207 - 12113 - 4

I. ①人… II. ①杜… ②韦… III. 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文集 IV. ①F320.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25617号

责任编辑：姜海霞

封面设计：欣鲲鹏

人类学与乡村振兴

——人类学高级论坛2019卷

杜发春 韦小鹏 主编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150008)

网址 www.hljrmcbs.com

印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6

字数 290千字

版次 2020年7月第1版

印次 202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207 - 12113 - 4

定价 6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人类学高级论坛/总序

人类学研究本质上是理论研究,要解决的是人类各民族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问题。人类学本土化的意义,就在于怎么把产生于西方的人类学这门学问引进中国,拿来解决我们中国自己的本土问题,甚至包括理论的本土化、对象的本土化、话语的本土化,还包括手段和队伍的本土化。人类已经跨入充满挑战与机遇的21世纪,人类学从西方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经过中国人类学家的不懈努力,中国人类学从无到有,从依附到独立发展,从引进到形成具有某些特点的中国学术倾向,始终着力于从事中国人类学体系的建立。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其精神实质是博大的世界目光,是科学的论证方法。因此,人类学要求人类学家跳出狭隘的地域限制,以一种俯仰天地、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宏观视野来审视其研究对象。所以对国内外研究的经验,我们要认真学习,但反对全盘照抄,纯粹的“拿来主义”是要不得的。只有将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人人类学研究实践相结合,在学习国内外研究经验的同时,发挥个人研究专长,在研究中强调综合取向,才能跳出西方学术界固有的窠臼,发扬中国文化兼容并蓄的传统进行研究。为此,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宗旨是:

1. 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

中国历史悠久是举世公认的,相关历史文献之丰富也是举世无双的。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是人类学一座古老而丰富的学术宝库。但是,几千年来,虽然出现过以《史记》作者司马迁为代表的历史学派,他开创了纪传体的研究方法,在《史记》中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做了我们今天所称的民族志描述,但其后,尤其是清代考据学派的兴盛,他们运用训诂、校勘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研究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使得近现代的学者往往只重史料的考证,却忽视了对经过考证的材料的理论升华。今天我们面对新世纪,在推进人类学本土化的时候,提

倡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重新审视、重新整合,做出新的解读和分析,从中概括出新的论题,升华出新的理论,使人类学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受一次洗礼。

2. 对中国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一向是人类学家们看重的研究方法,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今天,由于人类学本土化的需要,田野调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人类学必须走向人民、走向社会,而不应该走进书斋、走进象牙塔。而走向人民、走向社会就是走进田野进行调查。当前在占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巨大的一次社会变革,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迅速转型为人类学提供了范围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田野研究园地。中国人类学家应该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对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空前的社会经济文化大变迁展开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写出不愧于这个时代的研究成果。只有这样才能让人类学理论在具体的田野调查中受到一次洗礼,从而使人类学的理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甚至从中升华出新的理论来。

3. 把对中国历史文献的人类学解读与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结合起来

西方人类学界有许多流派,其共同特点是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中国学者的特点是擅长历史文献的考据。而人类学的研究则既要求中国的人类学家从考据中跳出来,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又要求中国的人类学家要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换句话说,就是要求中国的人类学家把对中国历史文献的人类学解读与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中国的人类学才具有生命力,才能产生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类学大师,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人人类学学派。

本着这样的宗旨,由中国海峡两岸 20 家有影响的人类学研究机构 and 机关单位发起设立的人类学高级论坛,每年或隔年举行一次。每次论坛的演讲、发言和论文结集后由决心推动中国人人类学发展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们坚信,在“人类学高级论坛”这个舞台上,将演出一幕又一幕中国人人类学发展的“大戏”。

徐杰舜

2002年7月20日

于广西民族学院相思湖畔

目 录

人类学与乡村振兴

- 003 赵旭东 乡村振兴的维度——一种理解农民生活基础的文化转型人类学
- 018 徐杰舜 乡村振兴与生态保护:以荔波为例
- 029 徐新建 孙九霞 李 菲 民俗·遗产·旅游: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
- 052 周大明 村改居后集体资产问题的思考——以珠三角为例
- 065 陈 刚 乡村振兴与旅游:发展人类学视角
- 072 彭兆荣 农家器乐——读王祯《农书》有感

乡村振兴与传统文化

- 089 孙九霞 庞兆玲 王学基 现代性拓殖与地方响应:少数民族盐业旅游社区的发展实践
- 103 罗树杰 论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保护内生动力的激发机制——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白沙镇旧县村的启示
- 120 黄 玲 器以藏礼 跨境共生:壮族天琴文化的创新传承——基于中越边境龙州金龙村落的考察
- 130 杨秋月 再造传统与消费文化:乡村振兴背景下剑川古城的非遗实践
- 143 龚 薇 “场域”视域下的尼汝藏族旅游资源开发与“氍毹”文化传承及保护的互动研究
- 154 冯舒欣 乡村活化与游客文化体验——以三个珠三角乡村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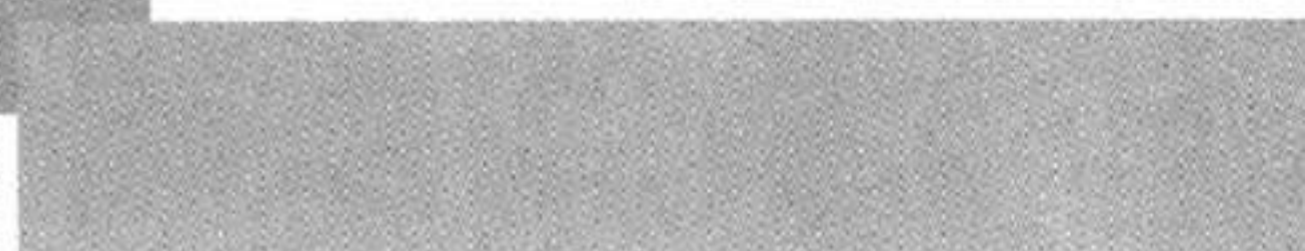
乡村振兴与社区发展

- 165 杜发春 生计转型视角下青海三江源牧民脱贫动力机制研究

- 182 王 华 张荣彬 精准与多元:贫困山区产业扶贫可持续性的路径探索
- 193 李陶红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遗产保护语境下的乡村发展——以大理茼村为例
- 207 柳 娥 马 婷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开发研究——以元阳县哈尼梯田为例
- 216 巴胜超 百变阿诗玛:文化旅游与乡土景观女性气质的建构
- 229 何庆华 乡土社会之家庭景观

会议综述

- 241 常小竹 杨秋月 人类学与乡村振兴——第十八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综述



人类学与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的维度

——一种理解农民生活基础的文化转型人类学

赵旭东

对中国的文化而言，乡村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其中内含着一种作为文化构成基本维度的人及其价值的观念。在这里有一个核心，那就是乡村社会里的家庭，它就像乡村社会的细胞，其生命力的高低会直接影响整个乡村社会活力的高低。而在家庭这个核心的乡村社会构成维度之外尚有土地这个核心的维度存在，相较于家庭在乡村社会中社会细胞的功能——成为活在其中之人的一种精神归属和寄托，那土地便是一种真正能够支撑起这一家庭核心持久发展和维系的物质基础。不论是何种形式的乡村建设和改造，这样的核心和基础都是应该受到研究者们极大关注的。乡村振兴因此也便是乡村里人的振兴、家庭的振兴以及土地利用方式的振兴，而所有这些都必然是跟文化，特别是乡村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的。

第一，不能将乡村振兴看成一个新问题，它应该是一个老问题在新时代的延伸或变形，并且还会随着新时代的发展而日益突出，成为社会发展中一个最为紧迫的甚至是枢纽性的问题。

乡村振兴既然是一个老问题，它自身必然会有种历时性的沿革，有一个曾经走过之路是是非非的来龙去脉，很多维度交织在一起，不可孤立地去看。乡村振兴同时又是老问题在新时代的延伸，那便一定有其新的意味在其中。“新”意味着一种转变，而转变久了、多了，并且特征固定下来了，自然也就意味着一种转型。

从转型的角度而言，社会之中最易于启动的转型往往是生计或经济的转型。对当代中国社会而言，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便是这种转型的开始，它带动了人们生计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其次便是制度或权力治理的转型，它跟后来出现的社会治理的转型几乎同步进行，但这

一维度的转型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象的，即便在今天也是国家行政在大力进行调整的一个维度。从总体上而言，用一种国家治理的模式去强化一种由上而下的轨道，使曾经的双规渐变趋同为一轨，成为这种转型的一个总特征和根本目的之所在。但可以肯定地说，所有的这些维度的转型必然会汇集并落实在一种文化转型之上。而所谓的文化转型，说得更为直白一点便是人们在价值观念上的一种新认识、新行为以及新转变，它们都是在前面一些转型发生之后所必然会滞后发生但必然会发生和出现的一种影响这个文明高度和深度的转型。

而乡村的文化转型，其自身一般不会独立发生，必然会有一种物质的以及制度的先行转变的实践发生，之后才可能有凝缩性的文化意义上的生成以及新的文化价值的创造。而诸多物质、制度的转型，最后都不曾预期地并接到了一种互联网的物质、技术以及产业的转型之中。最后，文化转型自然也离不开这些物质基础的转型而发生。但无论怎样，有一点是应该清楚的，即在所有这些转型中，乡村都成为尝试做出转型第一步的试验场。不论成功与否，乡村必然会成为先行试验的基地。从改革之初的“联产承包”到合作医疗，到最近实施的“美丽乡村”，再到日益蓬勃发展起来的农村电商、乡村旅游以及脱贫攻坚，等等。乡村的广阔性及其自身雄厚的土地资源，会使这种尝试在不断试错中获得方便的启动和真正落实。

乡村在这个意义上必然会处于新问题叠加到老问题之上的处境。与此同时，老问题还会再转化出新问题，甚至盖过新的问题而生发出一种更新的问题供乡村问题的解决者去加以真正解决。而这样的历程，可以说自西方启动现代性观念之后，它就未曾真正地停止过，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时期解决问题的概念、方法和路径不同而已。

第二，不能单一地或一元地去看待乡村，而要真正复杂或多元地看待乡村。乡村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随意凑成的，其落在历史文化的脉络中，需要有人真正对其进行一番梳理，才能知道事情的原委，否则盲人摸象的比喻便是对这些不懂乡村之人的绝好讽刺。

显然，在既有的乡村研究中，研究者更多的视角是单一向度的，思路也往往惯于简单化，似乎只有这样去思考，才能真正体现与现代都市相对而言的一种原始、落后和传统守旧。但真正在乡村住下来并做过实地乡村调查的人都清楚，在社会复杂性这一点上，乡村一点都不比城市简单。

单就我们所熟悉的法律这一向度而言，表面上看，城市存在复杂的、完备的法律，法官和律师的矜持和自信，令人们不会怀疑城市法律的威严和有

序，但细细想一下，城市人口中究竟会有多少人是通过动辄诉诸遥远且陌生的法庭来解决邻里纠纷的呢？但城市社会为维持这样的大多束之高阁的法律所付出的维护成本却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这些法律制度的维护成本最后都要一一分摊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的身上，也就跟人们生活里的核心要素——金钱这单一线索致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看起来是复杂的，但它又可能变得极为简单，因为城市里的治理，一切都似乎化为金钱这一单一指标在解决问题，人也被这个指标束缚得死死的，难以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可言，那种想当然地把自由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人，恐怕实在是没有把自由本身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想清楚。而在乡村社会中，所谓法律的意义，最为便捷的理解便是那些祖辈留下来的风俗习惯，从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到婚丧嫁娶的人生重大礼仪，都会受到这复杂多样、内涵有许多解释空间可供选择的的风俗习惯所制约，因此这些习俗表面看似简单，实则极为复杂，非要有专门的老人以及有威望之人去掌管不可。而且维护这些风俗习惯的成本相比维护大城市的法律制度也着实少得可怜，可能一顿普通的饭菜、一顿普通的“团结酒”，便会使纠纷成功地得到解决，双方就此言归于好，不留下一点怨恨的种子，社会秩序在很少的成本投入的基础上又归于一种宁静。这种息事宁人的做法，表面看似没有什么真正的法律内涵可言，但却含有一种无上的社会与文化的内涵。

此外，在乡村，应该清楚的是，生计或经济也是多元而非一元的。一辈子只当种地的农民的人，并非在乡村社会中占据多数。在农业之外，作为农业补充的副业的蓬勃发展反倒使一种乡村社会生活风险得到了降低。乡村副业在适时调整着和控制着农业供给上的不足。因此，但凡在农业社会之中，有一点都是必然存在的，那便是一种农工相辅的独特产业结构，并因此城乡之间才真正开始有了一种不可分离的相互联结和联系。

第三，从地理学的意义上而言，我们完全可以用平原与高原、河谷与山地以及湿润与干旱这样的地理空间的区分术语来称谓农业的生产和生活，也可以用农民、工人以及知识分子这样的人群区分概念来区分人群类型。当然，对多民族国家还可以用不同民族来称谓那些风俗习惯大为不同的人群，比如苗族、彝族以及蒙古族之类。但对于乡村本身而言，这些恐怕都是次起的概念，都不能用来作为理解乡村特性的根本维度。实际上，乡村的根本维度就在于土地，它对农民而言可以用来种植庄稼以及经济作物，从而有所收获，甚至还能使一家几口人衣食无忧地生存下来，枝繁叶茂地发展壮大，这就是土地对农民以及农业社会而言的真实意义所在。一旦离开了土地对于农民而

言的这些功用，农民作为一个群体离开土地去谋另外一种生活的的时间也就不会太久了。

因此，在乡村社会中，人们试图用各种方法去经营土地的目的仅在于土地所独有的那种自然的生长力和供应力。任何一种方式的现代农业，如果抛开了土地的问题而去谈论农业问题，实际都是没有什么真正意义可言的。

对土地之外的一切，在农民的眼中都是次起的，属于现象层面的，而非具有一种本质性的决定性作用。

不论是世俗世界之中的复杂社会关系，还是基于超越性的一种人和神的关系，在农民的世界中都是可以商量、更改以及转变的，但无论怎样，唯独土地和人的关系是带有根本性的，也自然是不可更改的。不论是哪一种土地制度，根本是人在土地之上辛苦劳作之后会有可以养活更多人生活的出产物，否则，对农民的价值而言都是不真实的，也自然是不稳定和不可靠的，不论家庭关系还是社会关系，甚至是那些离现实很遥远的超越性的关系，这一点认识都是可以成立和经得起检验的。

第四，乡村振兴的一个基础维度应该是文化价值意义上的，是基于文化转型而对乡村文化的价值做出的一种全新的调整，我们必须注意到其发生了变化的那些部分，同时也要注意那些没有改变的作为文化硬核的部分，变和不变的文化维度在乡村社会中都是真实存在着的。

实际上，任何社会都在遵循一种变迁的逻辑，在这一点上，乡村社会自然也不例外。从家庭关系到生活价值，再到宗教信仰之类，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之间会存在极大的差别，这是毋庸置疑的。

改革开放之前的婚姻关系以及经历过改革开放 40 年之后的家庭关系，前后的形态就必然有所不同。比如我调查过的河北李村，结婚娶媳妇曾经很少要彩礼的一个华北平原的村落，随着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欲求生育男孩的愿望使得乡村里的男女结构失衡，男多女少成为一种趋势，这自然也影响到了婚丧嫁娶的礼仪上。李村的男子到了法定结婚年龄，或者更大岁数尚未娶到媳妇的人，在这个村子里大有人在，这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流行”。显然，这就是一种变化、变迁之“变”，但却不一定是转型之“变”，只有在婚姻的基本构成性要素被抽取和替换掉才可能有一种真正的转型发生。比如现代都市社会中“丁克家庭”的出现，也就是只有夫妇两人而无子女。如果这种家庭普遍流行，那也就意味着先前婚姻关系下的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家庭关系发生了一种真正的转型。再比如，如果超过了法定年龄，大多数人还不结婚成家，也可以看成一种婚姻家庭关系上的转型，即一种结

构意义的改变。

在这方面，乡村家庭的内核是由两方面构成的，一个是种地的农民，一个就是由种地的农民所组成的一个个的家庭。种地的农民无法自然生成一种市场意识，更没有罗马法那种必要时可以通过割肉来偿还受害者损失的法律观念。在这方面，损失可能就是损失了，如果土地今年歉收，那只能认命，期待着来年会有更好的收成，他不会向任何人，甚至也不会向“老天爷”去苛求自己损失的补偿（最多只能是一种祈求）。这种观念反过来又助长了一种生活中有得无失的观念。因此，在农民的心灵中只有一种收获观念，很难有一种损失观念，收获就是人生的圆满幸福，而损失则只能算是一种本该得而未得的不幸，是一种没有办法的事情，更可谓是一种无奈，跟今天资本市场逻辑的先失后得，甚至风险投资意义上的失去越多补偿越多的观念是毫不搭界的。也可以说，在得失的问题上，这属于两套不同的思维逻辑。

并且，收获之物也很难有所谓的长期积累和储存。所谓的乡村收获物的储存和积累不过就是在来年青黄不接之时，一家人尚有余粮可以食用，储存的目的就是度过从秋收到夏收乃至下一秋收这段时间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在一种资本意识之下的无尽头的金钱上的收入和积累。对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而言，金、银和钞票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到了秋收之时，自家收获的堆成山的粮食才是真正的硬通货。金、银和钞票只是那些有着固定收入或不依赖于土地而生活之人的一种炫耀品罢了，只具有符号价值，而不具有实质生活的意义。

但这些硬核性的乡村文化价值的构成要素，在当下时代里都在发生一种根本性的转变。不仅是金银、钞票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成为最为基本的交换物，同时，市场的逻辑作为外来的涌动者，也日益浸透到农民百姓实际的生活之中，一种价值意义上的文化转型正在中国乡村发生着。电视、网络以及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成为寻常农家必备的交往、交流以及使得生活闲暇有趣味的技术和物质的依赖，而且，农民抛下锄头玩起股票也并非什么罕见之事了。

第五，显然，如果这种文化转型发生并真实落地，对于乡村的生活而言就可能不再是一种基于世外桃源图景的浪漫想象，而是面对这些改变、转变乃至转型而必然要有的一种真实应对和行为选择。不论何时，乡村都会相较于城市而存在着，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并被固化下来以满足城乡各自需求的一种互惠性关联，也以此造就了一种生活上的可循环性。但与这样一种自然的城乡均衡性存在相对而言的则是以城市为一种美好生活象征的城市空间

的大范围的扩张。这种扩张，其速度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形成的城乡关系格局。

此时，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城市空间，或无形中因为城市的扩张而在一个被重新划定的新城市空间而居住下来，或者假设有一半以上的人都生活在通过“摊大饼”而摊出来的无限广大的城市空间之中时，那可能便意味着，那些不属于这一半的人口，或所谓不占人口多数的更少数的农民，他们已经不用像以前那样，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土地的生产上，借此去养活更多的并非从事农业生产的相对少数的人口群体。他们因此将会成为乡村社会的留守者，依旧守护着名义上属于自己家庭的那些土地，过着自己既有生活，他们不再是生活的创造者，也不是一种生活的传承者，更不是自己生活的引领者，他们只是最后的留守者。

但很显然，这样的日子并非那么一帆风顺，贫瘠、无人照顾、失去友邻的扶助等，都会使得这样一种留守成为落日黄昏一般的景象，曾经的匍匐于田地之上的勤奋劳作被挤出了生活轨道的一路衰落乃至衰败和凋零便是其主基调。因此，留守乡村无疑是一种消极和负面的行为，从一种生命意志的角度而言，人的快乐必然是要基于一种与时俱进的创造力来实现的。如果是这样，乡村本应该成为一个创造性转化的基地，这样的生活选择才可能是积极的和有希望的，这样的未来才可能是乡村振兴的未来。

第六，在乡村的传统中，人们很难在一种时间和空间上去加以计算，人们理解时空的方式是一种自然属性，少有抽象。在这样的世界中，时空是偏向于自然的而非人为的时空，人们没有刻意地因为功利性的效率观念而使自己被排斥在时空之外。

在这样的世界中，山就是山，水就是水，人们融入其中，感受其滋养万物，却并不会将其界定为吸引游客的游乐场；日出便是太阳升起，日落便是太阳落下，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背后就是一种可以在这样的社会中不断去循环的时间，但绝不是今天刻度细到分秒的抽象意义的时间，更不是“时间就是金钱”意义上的挣钱工具。而空间自然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理性计算的海拔高度以及汽车一小时可以跑多少公里的路程这样的在全世界哪里都通用的空间概念。人们所遵循的自然坐落的结构安排，难有真正的改变和创造。山高水长，千山万水，它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阻隔，远古不会有人基于效率的缘故而想着非要开山凿壁修一条高速公路来连接彼此，即便有，也只是适应当时当地的交通工具，水上搭建木桥、石桥，山中凿通崖壁，便于彼此隔绝之地的交通往来。

但自从汽车被发明出来并得到普及之后，道路的抽象化发展就一直没有真正停止过。有时我们在长距离的高速路上开车，如果不是路标的不断提醒，我们可能真的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在此地还是在他乡，因为从结构、功能和形态到图像、颜色及感受都是差不多的，分不出彼此。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乡村的转型中有一种重要的转型就体现在一种时空的观念上。如果费孝通八十多年前所研究过的位于江南的开弦弓村开始出现了早晚高峰的堵车场面，人们时空观念的转型也就在所难免了。但在传统乡村里，最远的离家距离也不过是一天能走一个来回的距离。传统的婚姻圈、祭祀圈以及市场圈，实际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人们日常生活所依赖的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大约不出十五公里的距离，差不多是人走一小时远的距离这样的范围。但随着今日各种形式的快速交通工具和道路的改进，这个日常的距离范围已经是扩大数倍了。但还是差不多一小时左右的时间里可走的空间范围之内，只是因为借助快捷的交通工具，活动范围变得极为广大了。在大城市生活之人，这一点会感受更为明显，每天上班一小时的路程去打卡，已经越来越成为很多人的平常了。

第七，农民世界的生活，它越长久，本质上就越要求在一块土地上去精耕细作。农民原本对于他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是极为熟悉的，这种熟悉并非现代人们所谓“地方性知识”意义上的熟悉，而是一种真正情感和情绪上的熟悉，一闻到泥土的气味，就会联想起家乡芬芳的气息。这是一种联想，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熟悉。因此，在一种土地观念引导下的农民的生活世界，它最为核心的可能并不是一种土地的占有，而是实实在在的土地的利用。

历次，或者任何地方的土地制度改革中，一种最为理想的观念就是能够实现“耕者有其田”。这种观念背后根本的含义便是要去充分利用土地而非占有土地，每个真正在土地上的耕种者才可能因此真正拥有一份自己要去耕种从而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土地。

这种精耕细作的农业，它本身是要求有一种相对而言的封闭性的。它自身最为惧怕的是由于某种开放性使得各种外来的力量对于一块土地上的一个村庄自成一体生活的侵入和干扰。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农业必然也跟现代的流动性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对立的关系，乡村一开放地面对外部世界，它的自主性也必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今天全部的农业问题，无非就是要去应对西方世界对西方以外世界的扩张、替代和转化，具体而言就是从中世纪就开始的走向一种世界扩张和基督教观念引导下的外来“非农”历程。这种历